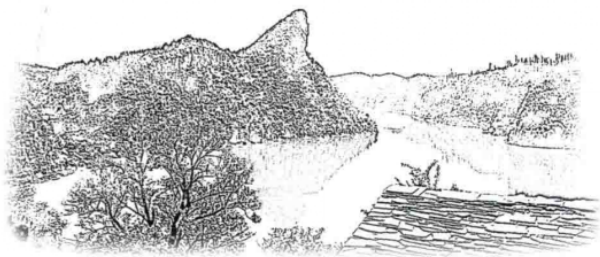


YICHAN · LÜYOU · XIANDAIXING
QIANZHONG BUYIZU SHENGTAI
BOWUGUAN DE RENLEIXUE YANJIU

遗产 · 旅游 · 现代性

黔中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

金 露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B24.201503

遗产 · 旅游 · 现代性

黔中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

金 露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产·旅游·现代性:黔中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 / 金露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308-15442-0

I. ①遗… II. ①金… III. ①布依族—生态环境—博物馆—人类学—研究—贵州省 IV. ①X321.273-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1971 号

遗产·旅游·现代性:黔中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 金 露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责任校对 陈佩钰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44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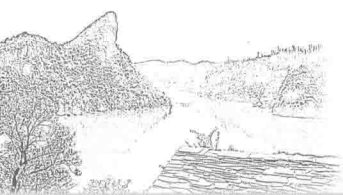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442-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YICHAN · LÜYOU · XIANDAIXING
QIANZHONG BUYIZU SHENGTAI
BOWUGUAN DE RENLEIXUE YANJIU

序言一

金露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她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应允。

金露博士的论文是以生态博物馆为调研对象;作为博物馆的一种历史延续和延伸,其知识和实践形制都在博物馆范畴之中。总体上看,博物馆的知识背景与博物学直接关联。在方法上,大致包括了“词与物”的历史表述。

由此涉及以下几个基本维度:(1)博物馆的历史来源;(2)现代性与现代博物馆的关系;(3)现代大众旅游与博物馆的功能性表述;(4)我国现代社会的博物馆主体形制为舶来物,其中所包含的“权力话语”问题;(5)中国的博物学,我称为“博物体”^①与西来的博物学(馆)在知识谱系上的融合与冲突;(6)生态博物馆在贵州少数民族村落所发生的遭遇以及适应程度和限度;(7)村落作为“乡土社会”的家园遗产如何与生态博物馆形制相结合;(8)生态博物馆的“活化”“活态”问题;(9)我国民族村落的生态博物馆如何在这一“洋装”上穿出自己的“本色”,即中国特色问题;(10)生态博物馆的世界趋势与我国村落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村落社会的所谓“扶贫”政策的关系;(11)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的经验留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与反思。

—

博物馆在历史语境中的表述,以及所形成的知识谱系与“博物学”存在着渊源关系。博物学这样被介绍:

^① 彭兆荣:《博物体:一种中国特色的生态概念与模式》,《福建艺术》2010年第2期,第30—34页。

进入18世纪,林奈(Linnaeus)和布丰(Buffon)等人确立了博物学……在大航海时代之后,由于逐渐与“异文化”产生大规模接触,无法用“基于神的意旨产生的万物连锁”来充分解释的多样事物,大量流入欧洲世界。面对这些未知事物的出现,18世纪的欧洲演进出一套认识世界的崭新方法,那就是让东西与其原本的脉络分离,仅以肉眼可见的特征为基准进行分类、排列、整理。这就是所谓的博物学。福柯(Foucault)曾说,所谓博物学,就是赋予可视物品名称的作业。诚如所言,博物学为在呈现世界的体系性时所使用的方法,最先着手的就是藉由命名来进行分类作业……

最早完成动植物世界体系分类的林奈,在其众所周知的著作《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 1758)中,将生物的世界阶层性地区分为种(species)、属(genus)、目(order)、纲(class)、界(kingdom)。林奈本身并没有采用科(family)的概念。最早将“科”这个阶级设于“目”和“属”之间的,是继林奈之后亚当森(Adanson)的著作《植物的科》(*Familles Naturelles des Plantes*, 1763)。无论如何,在此时期所成立的这些分类中,kingdom与class、family等近代社会组织用语,对于我们思考博物学的性格非常有帮助,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以看待社会组织的相同观点,对生物界进行了分类、重整。^①

从知识背景看,博物学为博物馆学提供了“新时代”的知识框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博物学(馆)是近代以降,特别是“发现新大陆”的历史为西方社会呈现了一个新的世界面貌,致使西方知识界以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去面对——这种“面对”包括搜集、分类、展示等具体的方法。博物学这一学科正是借用了“传统”社会组织方面的知识而“发明”新的划分体系,其中有三个关键因素:对“物”重视和搜集保存;采用新的分类体系和方法;凸显知识和理念的话语权力。现代博物馆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具有明确的现代“权力”特征。福柯认为,博物馆作为一种工具已经替代了监狱,成为一种国家权力。这是因为博物馆具有权力和权威以控制那些到访的观众接受国家的宣传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点。^②伯内特(Bennett)说得更直接:“作为体

① 吉田宪司:《博物馆与搜集的历史》,载黄贞燕:《民俗/民族文化的搜集与博物馆》,台北艺术大学,2011年,第11—12页。

② James Cuno. *Museums Matter: In Praise of the Encyclopedic Museu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3.

现权力的异己和强制性原则,它采用胁迫民众进入到指定目标的方式——博物馆也就成了作为公众、公民被指定的目标领域,以甜言蜜语的方式将民众引入到与权力相共谋的对象领域,而博物馆作为特殊表现形式以展示权力的存在。”^①所以,现代博物馆具有权力和权威以控制那些到访的观众接受国家的宣传,而这一切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表述。

从认知的角度看,对于如何看待从过去(时间)遗留和“异域”(空间)获得的“文物”,关涉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的主题,关涉一种特定的社会价值。“遗产”最初是与19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自由现代性(liberal modernity)观念及运动联系在一起的^②,这些运动激发了对“过去物质”的热情。启蒙理性带来了“客观真理”“自然知识”这样的理念,进化论则为当时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提供了支撑。社会急速的工业化进程、法国大革命等强化了人们的“历史意识”,随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强化着“血缘与地域”(blood and land)的民族认同观念^③,也促使人们到“物质过去”中寻求认同的资源。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即所谓“异文化”通常是无文字的人群和族群,因此,“物质文化”便成为民族志者极其重要的观察、了解的对象;这样,人类学和博物馆学殊途同归:它们都关注物和物质文化,将文化同物质一样视为静态的、不连续的特质的累积,就像自然科学家收集蝴蝶标本的方式一样。通过物的分类和展示,呈现浪漫的异国情调,表现标本由简到繁的序列。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专业人类学者渐增,人类学的研究与人才训练重心逐渐由博物馆转移到大学中。^④博物馆学和人类学,看似都是研究物及其分类,实际上,二者均是通过具体的物去发现、展示物背后的原因、价值,进而呈现所在地的社会结构、文化特质、物与人的关系等。就博物馆而言,它们通常通过一套陈列方式,包括解说程序来帮助参观者获得对这些“物”的想象,这一过程被称为物的博物馆化。

现代博物馆具有为公众服务的社会化功能,“为了公众的缘故,博物馆

①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95.

② Laurajane Smith,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17.

③ Bjornar Olsen, *Excavating the Other: European Archaeology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In Zbigniew Kobyliński(ed.), *Quo Vadis Archaeologia: Whither European Archae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Warsaw: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2001:53.

④ 王嵩山:《文化传译——博物馆与人类学想象》,稻乡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必须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展示物和事物——即不仅仅只是为了展示它们,展示本身也得按照合乎逻辑的分类体系”^①。1887年,后来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当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博物馆管理员,就对当时博物馆的内部系统就像一个堆满了文物的场所进行批评,他对此的意见是,博物馆内文物之间的关系就像生物样本一样,所有的部件都形成相互的关系,即“具有历史关联和关系的民族学样本”(the ethnological specimen in its history and medium)。博厄斯不仅提出这样的主张,而且还在博物馆的展示方面贯彻他的这种思想,他提供了增加一种他称之为“生活组群”(life groups)样式,即将所展示的器物根据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和仪式中使用的物件,像戏剧化的情境进行排列和展示。他还把他的思想和模式移植到了大学博物馆的展示体系之中,并成了后来美国大学博物馆的一种重要的模式根据。

从词与物考证,museum有两个原生意义和指喻:该词源自古希腊专门掌管诗歌、艺术和科学的女神缪斯(muses)。“音乐”(music)亦同源。在古希腊神话传说,特别在荷马史诗《奥德修纪》里有详细的记述。在古希腊,museum原指专门祭祀缪斯的缪斯庙,这里收藏着女神所掌管的物品,当时各城邦均有缪斯庙,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建于公元前290年的亚历山大城缪斯庙,它对希腊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现代博物馆、美术馆的先驱。

缪斯的母亲是记忆女神,因此无论是博物馆的字源还是意源,“记忆”都是一个重要概念。据此,博物馆也是通过知识,让参观者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完整地联接在一起的记忆过程,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收藏和展示“物”。^②也有将博物馆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诠释:博物馆展品是“死”的,博物馆收集器物的过程便是一个器物与生命脱离的过程。阿多诺(Adorno)认为德语 museal 即“像博物馆那样”(museum like),这个词描述的事物与观者之间不再有至关重要的联系,所表现的是“死亡”的过去。它们被保存下来,是人们

① James Cuno. Museums Matter: In Praise of the Encyclopedic Museu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33.

② Willard B. Moore. Connecting the Past with the Present: Reflection upon Interpretation in Folklife Museum. In Patricia Hall, Charlie Seemann(eds.). Folklife and Museums: Selected Readings. Nashville, TN: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87: 51-58.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而不是因为现代社会需要它们。^① 在西方,博物馆理论沿着自己的知识传统,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有着完整的理论谱系的博物馆学,虽然它与 natural history 有些历史关系,却不是同一物。

就博物馆的历史形制,西方博物馆从私人收藏到公共博物馆,到今天已是各种新博物馆形式层出不穷。筹建于 1753 年的英国大英博物馆是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现代博物馆(1759 年 1 月 15 日)。1946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简称 ICOM)成立于巴黎,其章程中给博物馆的定义是:博物馆是指为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该定义多次修订,1974 年修订版说:“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收集、保存、传播和展览。”^②2004 年增添物质和非物质的概念。如今,博物馆已被视为是集文化遗产的收集、保存、展览、研究和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机构。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了很多新的博物馆形式,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侧重于区域性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和社区参与。一方面民俗博物馆、社会历史博物馆、遗产中心等新博物馆对国家博物馆和其他国家主导的公共博物馆等传统博物馆形式形成挑战,另一方面博物馆形式、功能也呈现多样化,比如遗产旅游,这一趋势标志着博物馆功能的娱乐化。

二

当用中国传统“博物”概念去翻译和套用西方的“博物学”“博物馆”时,我们需要反思:(1)西方传统自成一范,分类细致和逻辑缜密,自然科学方面尤甚。将 natural history 和 museum 译为“博物(学/馆)”造成历史性误会。(2)我国传统“博物志(学)”在价值体制、知识分类和呈现形制上与西方大相径庭,属于正统经学以外的特殊体制和体例。(3)用同一个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博物志(学),也不是 natural history 和 museum 本义去对应,便出现三者原本非一物因用同一个语词而误以为一物的窘境和尴尬,导致认识上的困境。

^① [美]珍妮特·马斯汀:《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钱春霞等译,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5—176 页。

^② 严建强、梁晓艳:《博物馆(Museum)的定义及其理解》,《中国博物馆》2001 年第 1 期,第 18—24 页。

中国“博物学”与西学的科制化不同,中国的博物学有一套自己的规范和学理;现在社会上普遍认识的这一用语是由西方引入的,“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甚或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刚好与西方的‘博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相对应……‘博物学’也是19世纪翻译西方著作时出现的新词新义”^①。我国自古就有“博物”(包括概念、分类、文体、知识相融合的“博物体系”)。从现存的材料看,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就具有这一特殊的“博物体”雏形,其内容涉及当时的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直到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正统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使“博物”从属于正统的分类体系,或者成为正统分类的“补充”。

我国最有名的《博物志》当数张华所著。综观之,笔者称之为“博物体”,包括(体识、体类、体用、体例)。全书十卷包括:卷一(地理:地、山、水、五方、物产),卷二(“外”、“异”国、人、俗、产),卷三(异物种:兽、鸟、虫、鱼、草木),卷四(物论),卷五(方士、服食、辨方士),卷六(考释:人名、文籍、地理、典礼、乐、服饰、器名、物名),卷七(异闻),卷八(史补),卷九、十(杂说上、下)。其中有以“物理”为题的专论,不过,它与“物性”和“物类”互为一体,即“物性(特性)—物理(关联)—物类(分类)”。

中国的博物学,作为经史子集补充的博物,在我国今天的“遗产运动”中尤其要珍视,其中体系、体性、体质、体貌、体征等都缺乏语境化的完整研究。如:《尚书》、《周易》、《淮南子》、《鬼谷子》、《抱朴子内篇》、《黄帝内经》、《吕氏春秋》、《山海经》、《史记》、《水经注》、《太平御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长物志》、《博物志》、《徐霞客游记》、《藏药药典》、《尔雅》、《说文》的分类等。《尚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经典之一”。根据孔安国《尚书序》中对其体例的分类,有六大类,即“典、谟、训、诰、誓、命”。典如《尧典》,记录帝尧的事迹;谟如《皋陶谟》,记载了宫廷上的君臣谋划和议论;训如《伊训》,讲的是商代老臣伊尹劝诫商王太甲要以史为鉴,加强德政;诰如《康诰》、《酒诰》等,是周王朝册封文王之子康叔的告谕,记载了周公对康叔的督导训诫;誓如《甘誓》、《牧誓》等,是作战前的誓师之词;命如《文侯之命》,是君王任命官员、侯伯的册命之词。^② 分类作为认知和表述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博物学独树一

① [美]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② 慕平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前言”第6—7页。

帜,福柯正是受到我国博物学分类的启发而作《词与物》。

博物学以“物理”为理,然而,中国的博物学有自己的“物理”。比如文字被公认为“文明”标志之一,汉字的历史独树一帜。与其说这只是文字类型的差异,还不如说是不同的认知和知识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直接导致了技术上的不同。以“书”为例,《尚书》古称《书》,“尚”即“上”,可理解为“上古的史书”。《说文解字》:“著于竹帛谓之书。”说明中国古代的“书”书于的材料。许多学者常常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文字符号的表述传统,与其制作、刻画、书写的方式和材料融为一体,这恰恰构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材料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在考量文明时或应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中的工具革命与文化变迁视为有机部分,甚至是关键部分。

中华民族之博物学,以地大物博为实,以天工开物为理,是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造化“天下”之“博物”与“物理”。

三

对人类而言,“家”是一个永恒的、最具实体性、最有归属感的社会基层单位,同时,也是遗产生成和代际传承的终端;虽然“家—家园”的概念和意义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其内涵和外延也不稳定,却从不妨碍其作为时代遗产的一个最重要的认同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家园”也是遗产依据、依存、依附的根本;而所谓的生态博物馆,即以村落、社区为基本单位的博物馆,无妨归入“家园遗产”范围和范畴。“家园遗产”除了可以表示“人类共同财富”的集体理念外,更多地强调每一个遗产生成、延续的具体;在此,“家园”是一个可以量化的地理空间单位(比如村落),因为每一个家园都有特殊的“自然—人文”生态。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概念主要指人群与环境的相处状态。

传统的人类学擅长于对“社会细胞”(家—家庭—家族等)的研究,同时,习惯于将遗产置于特定社会历史的知识谱系中去看待和考察,以确定某一个特定遗产的生成理由、认同方式和传承依据。在词语的关联和使用上,“遗产”(heritage)与人类社会中的继承权与继嗣制度(heritance)存在着原生性关系。人类学在亲属制度的研究中,将亲属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确定以“家”为实体的“共有关系”和“共有财产”的继承方式,形成了人类学对家园遗产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地方性村落和宗族组织范围内,“共有财产”首先表现为对家族、氏族、部落等公共土地的占有和同享情况。这事实上是我国“乡土社会”中传统农业伦理和社会秩序中最具“宗法制”传承效力的部分。

所以,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必然与家园遗产相叠合。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立“家园遗产”的概念旨在强调遗产的原初纽带(primordial tie),虽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中,遗产已经从地缘、世系(lineage)、宗教等范围上升到所谓“突出的普世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层面,成为“地球村”村民共享的财产,但这并不妨碍任何一个具体遗产的发生形态和存续传统的历史过程和特定“家园遗产”在归属上的正当性。具体而言,现在的遗产所有权基本上属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比如在我国,“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但民族国家从概念到实体从来就是“想象的”、“有限的”、“有领土范围的”、“时段性的”现代国家表述单位。也就是说,多数历史遗产在从发生到存续过程中的归属权并不在国家。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后现代的背景下,也因为遗产的所属权发生“转换”,原先遗产的所有者丧失了对它们的认同与继承关系;这样的情形对于绝大多数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与传承并不完全适用。所以,强调“家园遗产”仍然极其重要。

同时,“家园”的边界并不是唯一的,它在不同的语境中和背景下会出现多条边界的重叠和套用;因为“家园”与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人们的认同也不是单一性的。首先,我们可以在“国家”层面上确定“家园”:国家也是家园。在我国的传统认知中,“家一国”在政治上是一体性的,即所谓“家国”;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为所属的社会群体承担和提供安全保障和利益需求。与此同时,这种国家的“家园”也可能构成民族主义的“形体逻辑”。换言之,当国家所属的社会群体将他们的情愿投入其中,将他们的利益关系引入其中,这个“家园”就有了形体上的依附性,而当这个“家园”出现了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冲突、矛盾、角力、抗争、紧张、友好、争取、释善、结盟等各种阶段性、事件性、战略性的关系时,“家园”中的成员会出现相对一致的力量集合;民族主义遂成一种习惯性的表述。

需要指出,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背景中,“国家”、“家园”的边界既有重叠又有区隔:重叠者,二者与我们所着重言说的具有分享传统习俗、历史记忆,拥有共同(或相关)的英雄祖先和集体认可的族群谱系,袭承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分配共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承担共同的守护家园的责任和义务,形成共同的生活习惯、语言交流和宗教信仰,表达共同的情感和心理趋向等有关发生关系上的差异——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后者则是自下而上的。区隔者,二者有的时候所表现出的边界关系一致,有的时候则是不一致的,甚至发生撕裂、冲突和斗争。不过,我们所强调的“家园遗

产”更偏向于指称一个具有特定的人群共同体的自主性范畴和范围,与“地方价值”密切相关。

生态博物馆作为“家园遗产”这一具有特定人群共同体“家园关系”的实现和体验,也必然产生“家园感”,它可以是“活态遗产”的另外一种表述和体验。然而,“地球村”的出现,一种更大意义、更高层次的“家园”宣告出现,传统的地方“再地化”(re-localization)也随之出现,“家园遗产”因此加入、注入了许多新质性无形遗产内容。

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作为我国的第一批生态博物馆中的一个(共4个),不少学者进行过调研,我国政府的主流媒体对这一批生态博物馆也有过跟踪报道,各种评价都有。对此,我的意见是:我们或许并不要匆忙地对这一新生事物做绝然的评判,而将其视为一种现代性中国化的实验与实践。

为此,金露的博士论文姑为一范;无论是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之案例,抑或是她本人的研究。

是为序。

彭兆荣

2015年8月1日于昆明荷塘月色

序言二

金露博士是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彭兆荣教授指导下较早在旅游和遗产领域接受系统训练的第三代青年人类学家。她本科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生态学双学位专业,期间多次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如对沈阳市西塔街朝鲜族聚居区的调研及对卞麦峪村土地问题的调研等。因为在学业、调研及其他方面的卓越表现,她曾连续四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专业奖学金,毕业后被保送到厦门大学继续学习民族学。她开始学术事业的时间相对较早,2005年、2006年就在专业期刊发表了学术论文,2006年、2007年开始在学术会议上提交论文并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

2006年开始,她在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并继续开展她的学术研究,她所参与的主要研究项目包括福建漳州官畲村畲族文化遗产调研、福建武夷山世界遗产监测调研、福建永定县土楼民族学田野调查、云南滇越铁路遗产线路及旅游品牌策划和贵州黔东南州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等。与此同时,她着手自己对于贵州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而此研究直接促成了这本关于民族、遗产与博物馆的著作。

金露博士还是博物馆研究的优秀年轻学者之一,这也是她遗产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6—2009年,她担任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讲解员。2009—2011年,她受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和菲比·赫斯特人类学博物馆(Phoebe A. Hearst Museum of Anthropology)访学两年。在此期间,她陆续在学术领域刊发论文,同时在美国、法国和中国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她在美国访学期间参加了我所主持的“旅

游、艺术与现代性”学术研讨小组,并在研讨小组上作以报告,她同时常规性出席旅游研究工作组(Tourism Studies Working Group)的学术活动。并且,我与她合作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兴起与发展进行研究^①,之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她的学术事业。2012年,金露博士顺利地从厦门大学毕业,任职于宁波大学,我受邀在2013年前往宁波大学讲授了旅游人类学课程。

2007年6月,金露博士首次前往贵州寻找她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点,自此她开始关注生态博物馆项目——新近在中国建立的乡村博物馆模式。她长期研究贵州的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群,特别是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她还关注法国生态博物馆的起源与发展,并于2011年访问了法国的几座典型的生态博物馆,同时她对其他西方的生态博物馆以及它们在中国的引入有所研究。这本书即是她研究的成果,更是人类学视角下中国生态博物馆建立历程的一个检验。

金露博士研究生态博物馆的视角是将自己作为参与观察者,而非时事评论员。她展示出民间与官方之间对生态博物馆理解的分歧——官方从西方吸收生态博物馆知识,并希望将其应用于中国实践;而当地村民将生态博物馆看作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他们可以从此项目中获取到自己所需。例如,为了提高镇山村建筑的视觉真实性,地方政府为每户村民提供一定数额的现金补偿用以重新装饰民居的外观,并评选出一户最佳民居给予高额奖励。这种奖励制度不仅能够给予村民补贴以维护他们的房屋,同时能够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和汉族游客来到村里旅游,提高其在村内居民之间、整个村落与周边表现得不那么传统的村落之间在乡村住宿和餐饮业中的竞争力。

所有文化博物馆的概念都是为保护与展现人类制造的器物,同时将其陈列出来以教育公众。例如,艺术博物馆的特殊目的就是展示现在和/或过去某一地点或区域,甚至整个世界的物质文化。然而,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混合体——它试图通过介入社区,维持一种前工业/工业早期手工艺及农耕形式,目的是保护一种特殊的、活态的过去与现在的关联。理想上,当地社区成员希望留存他们过去经验的某些方面以抵抗现代化的侵袭,并将这些经

^① 纳尔逊·格雷本、金露:《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兴起》,《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第1—11页。

验传递给他们的儿女及继承人。^① 村民们不一定非要“放弃”他们更“现代”甚至成为城市居民的变革,事实上保持过去以怀旧和教育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之一。

以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在概念上实际分为两部分。最显而易见的部分是“资料信息中心”,这里主要展示关于过去的物质证明——手工艺、服饰、工具、历史资料等,这些物质证明与一些文字说明、地图一起被保存及展示,有时兼具娱乐性。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的建筑距离村子大约 1 公里,从村中步行 20 分钟或者开车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因为距离村落中心有一段距离,所以它经常被外来游客及地方村落中一些不太参与村落活动的成员们称为“博物馆”。然而,生态博物馆^②的目的并不是排除现代方式,其与传统博物馆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异是保留传统耕种方式及手工艺过程,以及它们的象征价值、引入素材和组织形式。在欧洲的案例中,当地社区是主要发起者和实践者,各级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给予资助并鼓励社区的行为实践,而非以旅游为目的。

金露博士调查了当地人对生态博物馆这一现代观念的看法,揭示了他们如何理解、误解甚至有时忽视生态博物馆的理想参与模式。按照一些村民的话来说,只有学生和游客会去资料信息中心参观。^③ 由于村民们没有充分了解生态博物馆理念,导致大部分村民放弃了传统的农耕方式,而这正是生态博物馆的核心理念。大部分村民会利用政府的帮助来照管他们的房屋,同时接待每周末从贵阳周边来访的游客。村民们会为游客们安排村口迎客酒的仪式,请一些身着传统服饰的村民欢迎游客的到来,并将游客接至他们的农家乐,有些会说服游客在他们宽敞的现代的“传统房屋”中留宿。

因为被授予“生态博物馆”之名,村落生活发生了改变。“保护”某些被

① 在访问贵州一些可以接待城市旅游者的少数民族村落后,我遇到几个乡村发展方面的领导。晚餐时,我问他们,有谁愿意花钱去看中国农民用镰刀耕种,而不是用机械的工具耕地。没有一个人举手,所以我总结可能中国目前还没有做好生态博物馆的准备。但是生态博物馆建设依然需要鼓励,因为很快这些人的子女可能愿意将这种怀旧的场景展现给他们的后代。

② eco-来源于希腊语的单词 oikos,意指将一个(农场)家户作为一个工作“组织”,而不是特别指涉自然。我们可以将一个与自然相适应的小型传统农业村落看作 oikos 的“工作模式”,一个文化的与自然的组织。

③ 当我 2012 年第二次去镇山生态博物馆时,资料信息中心的部分建筑已经被某当地企业占用,不再发挥其博物馆功能。

挑选出的传统、生态博物馆的名望以及广告宣传为村落带来了财富，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具体表现为家电、网络、摩托车、汽车等形式。与之前“孤立的”村落相比，其与城市生活、整个中国，甚至是中国以外世界的联通性越来越密切。家庭愈加富有，孩子们获得更好的教育，但同时个人主义和移民的情况也在增加。村民们开始关注他们特殊的民族历史、古老信仰及传统习俗等，新的“习俗”和“传统”因旅游而创造，如各种节庆活动的复兴和再造。正如爱德华·布鲁纳所言，它们并不是“假的”，而是另一种更新形式的文化变革和创造力。

金露博士正在成为研究中国乡村中遗产、旅游、传统与现代性角力的领军人物。同时她在宁波大学讲授相关课程，将这一课题的重要性通过授课散播出去。目前，她正在研究浙江安吉一个非同寻常的生态博物馆系统，在此生态博物馆系统中共有1座中心馆，12座专题生态博物馆和20余座村落文化展示馆，每座村落馆都有自己的资料信息中心，并有专人接待访问者，同时它们与地方自然环境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①

能够遇到并指导金露博士我感到非常骄傲，与她一起工作十分愉快，她是中国旅游、遗产及博物馆研究的一名优秀的人类学者。我相信本书的读者将会在书中找到相关研究的模式，并能够激发读者思考在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

纳尔逊·格雷本 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015年7月

^① 2013年开始，我和金露博士开展了一项关于生态博物馆系统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目前尚在进行中，研究成果将于近期发表。